

负笈燕园

在这部长达三十余万字的回忆录中
记录下北大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倾注了作者一生真挚热烈的「燕园情结」

1953-1957：风雨北大

马 嘶著

负笈燕园

1953-1957：风雨北大

马 嘶著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负笈燕园 1953—1957:风雨北大/马嘶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8

ISBN 7-80080 098-9

I. 负…

II. 马…

III. 北京大学—史料—1953—1957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634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625 印张 35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

G·149 定价:26.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初进燕园·····	1
第二章 名师荟萃·····	14
第三章 朝朝暮暮·····	50
第四章 北大诗社·····	72
第五章 生命之春·····	99
第六章 旧友新朋·····	127
第七章 静水微波·····	152
第八章 东风化雨·····	165

第九章 变革之年·····	218
第十章 早春天气·····	295
第十一章 湖畔惊雷·····	342
第十二章 离校以后·····	473

第一章

初进燕园

1 1953年一个晴朗的秋日，我躊躇满志地离开了故乡，去到北京大学求学。

我的表哥侯振华送我去火车站。他替我背着行李卷，我拎着一个盛放脸盆和洗漱用具等杂物的网篮，走在通往县城车站的乡路上。已经是10月中旬了，地里的庄稼已收割完，原野很开阔。头顶上有很好的太阳和蓝天，此刻，我的心境也如这旷野、蓝天、阳光一样美好，摆在我眼前的是一条如阳光般灿烂的人生之旅。

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我就成为一个大学迷了。1951年暑假，我在北京的伯父家里住了一个月，我常常走到不远处的和平门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外踟蹰徘徊，艳羡地望着那一幢幢灰色的楼和一株株老树，注视着从那里走进走出的每一个人。在高考的那几天，我天天跑到这里来观望，神往地看着那些匆匆来去的考生和一些教授模样的人，我混杂在参加高考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群中，默默地在那里

探听着关于考试的信息。我还一个人跑到沙滩，在我向往已久的北大红楼附近踟蹰着，甚至在红楼对面的小饭馆里买碗炸酱面，坐在粗陋的饭桌前慢慢地吃着，去体味我从小说和电影里看过的穷苦大学生的那种有趣生活。而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圆了我的大学梦。

表哥不断向我打听大学里的情况，他说：“北大一定很大吧！”

我想起了不久前在《旅行杂志》上读到关于北大和燕园的介绍，那篇专门描写院系调整后的北大的文字，概括为“诗的北大，散文清华”，描写了湖光塔影的美，还有图书馆里柔和的灯光，每个座位前一盏台灯的图片。虽然，我对于即将在那里度过四年时光的北大知之甚少，我还是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我所知道的一切，略通文墨的表哥也听得入了迷。

火车经过芦台站时，我久久地向北面凝望，但我望不见曾经在那里度过三年美好时光的母校——芦台中学。我掏出一张纸片，在上面写了“再见吧，母校”几个字，打开车窗，让它随风飘去。

但我的心中没有怅惘，我的心里只有喜悦和自豪。我想起了几天前回到芦中去办手续时的情况，我像一个胜利者那样被老师和低年级的学友们欢迎着，作为那一年被北大录取的惟一的一位，那很有点仕宦回乡、光宗耀祖的味道。被那种荣耀的快感鼓荡着，我一路上做着种种美梦。

下午，火车停在了北京前门车站，我下车了。那时，北京只有前门一个火车站。

在站前的广场上，飘扬着迎接新生的几所大学的校旗。在那里，我遇见了几个中学的同学，他们有的考取了地质学院，有的考上了矿业学院、石油学院、钢铁学院，大家都热情地相互打着

招呼。我找到了北京大学的校旗，上了一辆卡车，驰向燕园。

我站在卡车上，双手扶住车厢板。车上有了十几个人，便开车了。我们彼此都不相识，但我猜想，这里面也许会有中文系的新生——我的同班学友。我们是拎着手中的物品上车的，迎接新生的人把我们的行李票要了去，由他去代办取行李的手续，然后送回学校，因而我们便轻装上路了。

汽车风驰电掣地向西郊驶去，强劲的秋风吹散了我的头发，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那时候，北京的大建筑物还不很多，但那城市景观也是够迷人的了。出了西直门，车速更快了，开阔的京郊旷野向身后飞驰过去，使人心旷神怡。过了中央民族学院，又过了中国人民大学，这些新建起来的高等学府，楼舍盖得蛮漂亮，但校园里树木不多，总使人有些干巴巴的感觉，我想，北大一定不会是那样。我的脑子里不住地回想着“诗的北大，散文清华”那句话。

汽车从偏门驶进北大校园，也走进了一个林木深深的幽雅世界，我的心中涌上了一股诗情。汽车停在第二体育馆门前，下了车，有人领着我们到西校门附近的办公楼去办入学注册手续，我的学号是5307027。办完注册手续，我领到一枚白地红字的北京大学校徽，立即别在胸前。校徽上的“北京大学”四个字是毛主席写的，我不止一次地看见有人戴着这枚极有诱惑力的校徽，长久地梦想着自己也能戴上这枚校徽。而今天，我真的戴上了它，我已成为一个北大人了。我自豪地在校园里走着，去熟悉新的环境。

学校的办公楼当时被称为民主楼，往里走便是一带广阔的草坪，有许多株松树和其他的树木，一对壮丽的华表伫立于草坪上，听说这是燕京大学建校时从圆明园的遗址搬迁来的。这对华表与那些黄绿琉璃瓦的飞檐宫殿式建筑格局相谐趣，构成了校

园古色古香的整体风格。

沿着整洁的水泥路，我经过了南阁北阁（旧称姊妹楼）、大图书馆、俄文楼、外文楼，又踏上了未名湖畔的石径，我看到了微波潋潋的湖水和湖畔那玲珑剔透的水塔，欣赏了有名的湖光塔影。我又在水塔不远处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看到了一栋面积很小却很高的陈旧灰楼，那灰楼上端似乎已经倾斜，形似一所危楼，它孤零零地挺立于很少有人造访、连阳光也很少君临的幽僻一角，墙上却挂着一块笔直的木牌，上书“北京大学学生会”，看那字体，又是毛主席所题。于是，我便对它肃然起敬了。后来，当我成为北大学生社团的一名负责人之后，常有机会去学生会，在那里，我果然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题词以及他写给北大学生会的复信。我不知道这是原件还是复制品，不过，这却证实了我的猜想是准确无误的。

燕园是一所极富园林之美的风景胜地，她比我所见到过的许多城市公园都要美。现在时令已届深秋，到处有艳红的枫叶，湖畔还盛开着许多色彩斑斓的花，还有数不尽的苍松翠柏、高大乔木、丛丛灌木和竹林。从我走过的这一段路，我猜测出，燕园的面积肯定是很大、很大。我的故乡是冀东平原上一个很大的村落，那村庄包括了7个自然村，中间还有池塘、水渠相连。而我出生的那个村的主街道，从西到东就有一里多长。如今，我直观地感觉出，北大肯定比我们那个大村落还要大得多。几天后，我在给父亲、哥哥、朋友写信时，就谈起北大比我们整个村庄还要大得多的话。

黄昏时，我坐在湖畔的青石上，望着暮霭笼罩着的湖面，长久地凝望着朦胧的湖光塔影，猜想着未来的生活，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2

1953 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过去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那一年，高等学校在院系调整之后，招生人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今年共招生 5 万人。在北大，我们新生入学后，全校学生已达 4000 余人，而我毕业时，则已发展到 8000 多人了。原燕京大学的宿舍早已不敷使用，新建的一些学生宿舍楼尚未竣工，我们新生中的男同学就暂住在第一体育馆。

第一体育馆坐落在未名湖东侧，是一座高大的灰楼，墙上爬满了长春藤。我们中文系一年级的男同学住在一间阴暗的大地下室里，屋子里并排支架起几十张双层弹簧床，地上只有几条窄窄的通道，两个人并肩走时便要窄着身子才能走过去。

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招收新生 60 余名，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华北、华东、中南、西南、东北各地的都有，似乎只没有西北地区的人。女同学只有十几人。那一年，工农速成中学的第一批毕业生升入大学，这批年轻的老干部年龄多在 30 岁以内，比我们从高中考进来的学生要大几岁，也有个别人已超过了 30 岁。在我班中，多数同学是南方人，北方人只有十几个。华北区的录取名单是在《光明日报》上发布的，北京大学在最前面，中国语言文学系又是第一个，我看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名字，那名单上只有十几

名，十分醒目。

同学们陆续来报到了，宿舍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说话南腔北调。人们一时叫不出名字，但都记得来自何方，便暂时以地名代人名，袁行霈来自青岛，便叫他“青岛”，范承祚来自扬州，便呼他“扬州”，叶传勋来自武汉，便叫他“武汉”，我来自唐山，便呼我为“唐山”。

在我们班上（中文系 1953 级），我第一个认识的是张永仁，他是江苏无锡人，中等个子，人很憨厚、朴实。我们很可能是一起进校的，我们一起办了注册手续，又一同去大餐厅用饭，便熟悉了，出出进进总是结伴而行。但他的话我听不懂，有时，一句话要说上几遍，我才能了解他说的意思。他似乎有几个中学同学也考进北大，他们常常来找他，我记得其中有个历史系新生黄锡章，他来得多，我便与他也相识了。在刚入学的那些日子里，我和他很接近，后来大家都有了新的朋友，便渐渐疏远了，但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常常说起中学时的一位教师，是陆定一的弟弟，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师，似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接着，我认识了许英杰，他是浙江天台县人，大家都叫他“天台”，这种称呼持续了两三年。许英杰个头儿不高，人生得老实忠厚，也很幼稚。二年级分专业时，他学了编辑（新闻）专业，我和他的感情一直很好。几年中，我未见他发过脾气，他总是那么乐乐呵呵、朴朴实实。毕业之后，不知他分配到哪里去工作，但我知道他是早殇的，大约在 80 年代，他就辞世了。

住在我邻床上的邢克忠，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瘦长的身体，头发梳得整齐光洁，人长得潇洒，很精神，讲一口东北话。他爱打扮修饰，皮鞋总是擦得亮亮的，衣服也很合体，很时髦。他很聪明，也喜欢卖弄。我们第一次谈话，他就问我：“你喜欢写东西

吗？写什么？”说着，他拿出一个硬面笔记本，翻开贴着他的作品剪报的一页让我看，他说：“我这篇散文得过奖。”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海浩”两个字，他说那是他的笔名。我只觉得我们的感情和性格都相距很远。他后来成为学校舞会上的一个活跃人物，很有点公子哥儿的味道。他学了新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日报》，听说工作得很不错。工作后不久，在一次出差时，汽车在山坡上出了事，他牺牲了。后来听人说，他乘坐的公共汽车遇到险情，他便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撞在山石上，摔死了。而汽车并未出事，别人皆安然无恙，只有他一个人送掉了性命。我不知道这事发生在哪一年，估计当是1961或1962年的事，他死时还是很年轻的。他是我班同学第一个死去的人。

住在靠墙下铺的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胖子，圆胖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他叫赵振忠，来自内蒙古工农速成中学。听说他是个老革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好像还立过功。在我们眼中，他是个神秘而有趣的人，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大哥。他买了很多书，那些书就摆在床头，天天翻看，但人们发现，他还带着中学语文课本。他似乎也是以老大哥自居，亲切地叫我们“小伙子”。他喜欢聊天，也愿意跟别人开开玩笑。他吸烟，常坐在床沿上吞云吐雾，他是个很随和的人，也似乎是个很善良很热心的人，而后来，他却因为学习吃力而跟不上班，年年假期因为准备补考复习功课而回不了家。最终，他却遭受到厄运，但他那时已留级，到了我们下一班了。

来自武汉的叶传勋，生得白净面皮，很英俊，性格又很开朗，说话时总是大声喊叫。听说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他在政治上很要求进步，在生活上自奉甚严，不要家庭的接济，以示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他的姐姐在团中央工作，似乎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她有时来看弟弟。在大学的四年中，我和叶传勋一

直在一个团小组里，很是接近，毕业以后我们一直有着来往。我记得，那四年，他似乎没有回过一次家。

我们的临时班主席史俊杰毕业于北京三中，他在中学时就担任学生会干部，显得很老练、成熟，也有些世故。他很活跃，也很会说话，对大家很热情，同大家相处得很好。他似乎是最早来到学校的，负责接待新生的工作，他同系里、同高年级同学都很熟悉。他似乎总是很忙，在宿舍里坐不住，老是往外跑，但我们已经感觉得出，他有很好的办事能力，也有很高的工作热情，能够团结全班同学。他也能写些东西，那时，他的一篇散文（念中学时所作）被选进北京出的一本散文集《小芦花》中，不知是谁先发现了这个事实，而他本人尚不知道。为此，同学中就戏称他“小芦花”。后来，史俊杰曾被选为北京市学联副主席，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学校，去北京学联驻会办公，经常坐了卧车各处去跑，荒废了学业，而他却恋恋于仕途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班上，但却很难安下心来学习，并且有一种失落感。他有一张同毛主席握手时的照片，是他参加全国学代会时，同毛主席握手时，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后来记者洗了一张送给他，他一直珍藏着。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听说他在那里干得很好，很受有关领导的赏识，欲提拔他当科长，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提，他便得了精神分裂症，后来愈来愈严重，竟落得不知人事，老同学去看他，他也不认识，甚至把自己的粪便也吃下。一个精明强干的青年知识分子，终至因为过分地耽于仕宦，便毁了自己的青春，真是令人痛心。

住在临墙一隅的胡复旦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是一个瘦高个子的鬚发青年，瘦长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玳瑁眼镜，很有些艺术家的风度。邢克忠对我说，胡复旦是中央歌舞团的歌剧演员，唱男高音的，因为嗓子坏了，才考进北大中文系。他是无

锡人，他同江浙的同学谈话时，说的是一口吴语，同我们说话时却是一口不太纯正的普通话。知道他是演员，同学们便常欢迎他唱歌，他总是不肯唱，实在推辞不掉，便说：“我试试。”他小声地唱出两句，那声音细柔而富抒情色彩，但只唱了两句，便停下来，忙说：“不行，唱不了。”尽管如此，在大家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歌唱演员。

扬州人范承祚是个很活跃的人，据说他曾当过学徒，后来才上了中学。他为人热情，善于与人交往，他是我们的临时团支部书记。他的年龄似乎高于我们这些本届高中毕业生，又低于调干同学，他是在中学就入了党的。他喜欢以籍贯代人名，他是最早把叶传勋叫成“武汉”、把许英杰叫成“天台”、把我叫成“唐山”的，而我们也称他为“扬州”。一年以后，他被保送去阿尔巴尼亚留学，在地拉那师范学院（后改为地拉那文科学院）学习。在阿尔巴尼亚，他写过许多热情洋溢的信，还寄给我一张摄于亚得里亚海岸的照片。毕业后，他成为新华社驻地拉那记者，曾作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马尔科访问中国时的翻译，同毛主席、周总理见了面，并任他们的翻译。70年代，他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成为一名很有名气的外交家。

过了几天，我旁边的上床住进来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伙子，他大大咧咧，爱说爱笑，一口浓重的东北腔。他来的那天晚上，就对我说：“我是朝鲜族人。”这我才知道他来自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也才知道中国有个朝鲜族，同朝鲜人说一样的话，生活习惯也大抵相同。他叫洪钟哲，这名字很像朝鲜著名诗人洪淳哲，因而一下就记住了。他选了编辑（新闻）专业，他喜欢照相，老是背着一个照相机，后来成了北大校刊的摄影记者，毕业后便也当了摄影记者。有些外系的朝鲜族同学常来找他，有的我也认识了。有的朝鲜族同学入了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朝鲜语专业，我当时想，朝鲜族

的语言和文字皆与朝鲜国家相同，他们为什么还要选学朝鲜语专业？后来才明白，朝鲜语专业学的是朝鲜语言文学以及历史等等，这同我们汉族人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一样的吗？

同学们渐渐地到齐了，我认识的人也多起来，我又认识了青岛的袁行霈，烟台的孙克恒，南京的翟奎曾，杭州的陈志明，四川的康式昭，山东的周强、丁尔纲，河南的段伟中、韩名显、乔先知，北京的金炳喆、徐仲元等人。

女同学们也常到男宿舍里来，她们住在18斋，一间宿舍住4个人，比我们这里的条件好多了。当时，班里比较活跃的女同学有黄珮玉、杨铮、徐清辉、伶军，还有后来当了支部书记的女工出身的于道仿。黄珮玉是位香港的阔小姐，她父亲是香港商会的副理事长，常来大陆观光，且参加过北京的节日观礼。黄珮玉是高中毕业回国的，做过一年教师，今年才考上大学，她是我们的团支部委员。她很随和，同大家谈谈笑笑，十分和谐。杨铮是个北京姑娘，毕业于北师大女附中，几个月前，她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谈入学志愿的散文，许多人都读过这篇文章，因而大家都熟悉这个名字。她长得白白胖胖，肤色姣好，戴着一副白色近视镜，说话先带笑，一笑两个酒窝。她穿着白衬衣，背带蓝裙子，那装束还像个中学生，也带着中学生的稚气和纯朴。上海姑娘徐清辉是大学教授的女儿，说话娇声娇气，咬文嚼字，典型的上海小姐气派。她人很聪明，喜读书，功课学得很好。听人说（不知是不是邢克忠）她似乎与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有什么亲戚关系，但我从未问过她，不知此事确否。伶军生得小巧玲珑，她是东北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听说她原是文工团员，这名字也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化名，但后来一直沿用这个名字。我也从未听她唱过歌，也许她并不是演员。伶军性格娴静、柔顺，她使我想起了40年代的女性。她后来同叶传勋成为夫妇，

到天津师范大学任教,主攻现代汉语。60年代,我同叶、伶夫妇有过很多交往。于道仿也是山东人,她有着大姐的风度,生活极朴实,善于团结同学。她的未婚夫考入清华,也是调干生。

班上还有两个朝鲜留学生——李昌德和金昌源,他们住在5院(乐斋),也常来我们大宿舍。后来,我的生活同他们有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3

过了几天，同学们大部分都来了，系里召开了一次类似开学典礼的大会，也兼有迎新的意思。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班主任冯钟芸先生，冯先生那时只有三十几岁，是副教授，担任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选”课。我们知道，她是冯友兰教授的侄女，她的丈夫是哲学系的任继愈教授。与中文系的几位先生见面，就是在这次会上。几位任课教师和主要教授被请来参加大会，由系主任杨晦先生把教授们介绍给同学们。这当然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一项内容，同学们都想认识一下这些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们。

系主任杨晦先生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他那清癯的面庞和直立着的半短华发，使我想起了鲁迅，仿佛也是这般模样。他朴实的作风与慈祥的面容，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善良又真诚的人。

我最早知道杨晦先生的名字是在中学时代。那时我正在河北芦台中学读高中。这个名字是与几位成就斐然的大学者同时闯入我的眼帘的，他们是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他们是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委，我们念的那课本就是这几位北大教授编纂的。50年代初，我在家乡的旧书摊上买到两本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其中一本是1948年出版的纪念朱自清先生的专号，那是朱自清逝世后不久编辑出版的，他的朋友和学生们写了一些诗文来纪念他。那一期刊